

美国汉学家孟旦： 创造“心灵簇”概念 彰显中国文化特质

□ 孙庆峰

孟旦（Donald J. Munro），1931年出生，密歇根大学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讲座教授、唐君毅讲座教授。他是美国汉学界的杰出代表之一，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人性论和伦理学，研究方法注重中西文化对比，并善于运用人类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现代科学成果，进而深入阐释中国文化的合理性、独特性和延续性。

（一）

孟旦出生在美国一个大学教师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高中毕业后，他先后在美国阿默斯特学院、法国巴黎格勒诺布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学习，1953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在美国和西欧求学期间，孟旦学习掌握了英语、法语、汉语等多种语言，也深刻领悟了多元文化，为以后的跨文化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大学毕业后，孟旦于1957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继续深造。他的导师是享有盛誉的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在狄百瑞的教导下，孟旦得以探究汉学研究的高层次领域。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为更好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孟旦前往中国台北，拜爱新觉罗·毓鋆为师，深入研习中国古典文献。接着，他又前往中国香港，跟随儒学大师唐君毅和钱穆学习。此外，他还跟屈万里和白川静学习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这些大儒和汉学家的言传身教，不仅让孟旦持续增强了汉语古文文献阅读能力、熟练掌握汉学研究方法，也深切感悟到儒学蕴含的生命魅力，使他在学术理论和人生体验上都获得巨大的提升。

1964年，孟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随后长期执教密歇根大学。他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汉学研究和教育体系，让该校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在教学之外，孟旦研精覃思、笔耕不辍，用英文出版了《早期中国“人”的观念》《当代中国“人”的

观念》《人性形象：一个宋代的肖像》《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等一系列高水平学术著作，将中国智慧引入西方社会。

除了学术研究，孟旦还在中美民间文化交流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半个世纪以来，孟旦多次踏足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广泛交流，成为中美跨文化沟通交流的重要使者。

（二）

作为一位研究者，孟旦努力用现代语言解读和深入挖掘中国哲学的核心要义，以使中国哲学中蕴含的智慧惠及当代。他的研究涉及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议题。

中国人性论与人的可塑性。孟旦认为，人性论在中国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而儒学的人性论尤其值得关注。他指出，儒家人性论是建立在人的“自然平等”基础上的。“自然平等”指每个人天生具备为善的潜能，每个人成为圣者的天赋都是平等的，在本性上都是相同的。这种“自然平等”的观念强化了中国文化关于人的可塑性信念。人人都有生而为善的潜能，而将这种潜能发挥出来，则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培养。中国文化强调修身养性，重视教育，并特别强调教师的示范，都是这一信念的重要体现。

心的观念与整体性思维。孟旦认为，儒家的人性观根植于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认知、情感和行动意图融为一体。他创造了一个词汇——“心灵簇”，以彰显这一整体性的特质。在传统的西方心灵观中，认知、情感和行动意图被视为独立的。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呈现出一种集合性的本质。这表明，人的认知不仅仅是关于知识的获取，还包含个体的性情和行动意愿等要素。这种思维方式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其更加注重道德伦理、情感体验和行为准则的统一。

中国哲学的意象性表达。孟旦发现，中国思想家善于利用意象来

表达思想。例如，宋代思想家朱熹经常使用水、身体、镜子、小溪、植物、园丁等表达象征性。西方也有相似之处，但使用远不如中国普遍。孟旦指出，对于理论而言，意象拥有独特的功能。每一个意象都对应着特定的理论观点，当多个意象交织在一起时，便能建构复杂而纷繁的哲学体系。孟旦认为，人们运用意象解释复杂事物具备两方面功效。一方面，意象呈现的结构性特点使其能够构建起理论中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这些意象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将理论中的概念和实体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意象激起的情感反应使其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人们对于意象传递的情感和情绪产生共鸣，从而更加容易接受和理解理论的核心思想。

儒学伦理与现代生物学的关系。受到现代进化生物学的启发，孟旦发现儒家主张与现代科学成果的切合之处，认为这正是儒家能够长期维持生命力的原因。孟旦指出，儒学人性论与现代生物学存在诸多契合之处。比如，现代生物学认为利他主义是由亲缘之爱逐渐发展而来的，这一点与儒家仁爱观念起源于家庭的观点极其吻合。再如，儒学推崇的“推己及人”修养方法与现代生物学发现的“共情”这一道德情感紧密契合。此外，现代生物学发现心灵的功能是综合而不是分离的，涵盖认知、情感和意志等方面。这一发现证明了孟旦所提“心灵簇”这一思维特质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三）

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既有西方汉学家的共同特点，又有自己的鲜明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他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

文化人类学探究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目标是理解和解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孟旦曾较长时间生活在中华大地，他采取收集资料、采访人物等方式进行田野调查，直接感受和体验中国人

的生活。在这种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他广泛涉猎中华元典，吸收文化人类学理论进行分析论证，以深入探究、梳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合理性。

孟旦力图摆脱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在从事研究过程中，他努力立足中国实际、从中国视角出发理解研究的对象。他总是以真诚的心态去研读原文，从不带有任何偏见和预设。他相信只有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才能真正洞察其本质。这种共感和移情的方法，使得他的研究能够深入实质、超越表面，也赋予其研究成果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智慧力量。

孟旦认为，中西文化确实存在某些质的差异，而恰恰是这些差异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他在研究中，注重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例如，孟旦对中西方的平等观念进行了精细分析。他指出，西方文化追求的是“社会平等”，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追求的是“自然平等”。西方平等观念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应享有特定的待遇，而中国传统平等观念则强调人们在进入社会之前就具有的共同性和平等。孟旦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出现西方式的平等观念，然而并不意味着没有平等观念，中国的平等观念其实早已融入文化深层。

孟旦倡导采用现代科学成果进行哲学研究，如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脑科学等。对孟旦而言，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客观、系统的方法，可以验证和论证中国哲学所涉及的概念。他将科学数据视为支持研究的关键因素，这些数据不仅能够加深对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还可以为哲学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这种综合方法不仅使他的研究更有逻辑、更加科学，也为探索 and 解释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生活中，当我们经过一些桥梁时，若是留心一下桥头的碑文，上面不仅详细记载此座桥的设计者、建造者，更清楚标明这座桥的“最大载荷”有多少吨位。除去桥梁，还有一些具有载重的机械设备的说明书上，亦清晰标明此设备能承载重量的“最大载荷”是多少吨重，或者此设备连同自身重量并能承载重量的“最大载荷质量”是多少。人们不禁要问：“上下五千年，古今汉字成千上万，从古到今人们为何要用一个开着荷花、顶着莲蓬、巨大荷叶撑起的‘荷’字来承载几十、上百、上千吨重的重量呢？”

“荷”字较早早在典籍中出现在《诗经》，在《陈风·泽陂》中有“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而在《郑风·山有扶苏》中则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对于“荷”的解释，东汉的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艸部》中说：“𦰩（荷），芙蕖叶，从艸，何声。”许慎说的这个“芙蕖”是古代江东即今天江南一带人的称法，这个其实就是荷的一种，又叫“芙蓉”。三国时代的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荷，芙蕖，江东人呼荷。”或正是这样的缘故，《尔雅·释草》亦作这样释义的：“荷，芙蕖。其茎茄，其叶蕖，其本蕖，其华蕖苞，其实莲，其根藕，其中

的，的中萼。”古人称荷，又叫芙蕖。它的茎干称为茄（jiā），它的叶子叫蕖（xiá），它的水下茎干叫蕖（mí），它的花叫蕖苞（hàn dǎn），它的果实叫莲子，它的根叫藕，莲子叫的（di），莲子心叫蕖（yì）。对于《说文解字》《尔雅》关于“荷”的解释，清代学者段玉裁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以为：“盖大叶骇人，故谓之荷。大叶扶摇而起，渠央宽大，故曰夫渠。《尔雅》假叶名其通体，故分别茎、花、实、根各名，而冠以荷夫渠三字则不必更言其叶也。或疑闕叶而补之。”

在古代，“荷”与“何”为通假字，《说文解字》中说：𦰩（何），儻也。从人，可声。”儻的本义是以肩承担重物，也泛指用头、用背等承担重物。宋朝的徐铉在校订《说文解字》时就“何”说：“儻何即负何也。借为谁何之何。今俗别作担荷，非是。”而著名学者容庚先生在其所著《金文编》中以为：“𦰩（何），象人荷物之形，说文何儻也。”徐铉先生所说，在传统的典籍《周易》中曾有所见用，在《系辞传下》即有：“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何校灭

耳，凶”是“噬嗑”上九爻辞。著名史学家金景芳先生以为：“‘何’与‘荷’同，肩负曰荷，是肩上扛戴着的意思。‘何校灭耳，凶’是说肩上扛戴着‘校’这种刑具，遮住耳朵，凶。孔子于系统下的解释旨在说明，善恶都是积小成大、积少成多的，所以对恶应防微杜渐。不能‘肩扛校具，遮住耳目’，等到了‘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较之《周易》以“何”为“负荷”之意，《左传·昭公七年》亦有“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以“荷”为承载之义。郑国的子产为郑国的公孙段之子丰施，把州县的田还给韩宣子，宣子推辞，子产说：“古人有句话说：‘他的父亲劈柴，他的儿子无法把柴背走。’丰施害怕不能承受他先人的禄位，更何况受大国的恩赐？即使您执政能够维持，以后的人如果碰上边境上磨擦，敝邑获罪，丰氏将受到重重的治罪。您把州县取去，是免除敝邑的罪过，而扶持安顿丰氏。”郑子产所说“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的“荷”字就是负荷、承担的意思。在《论语·宪问》篇中也有以“荷”为承载记述：“子击磬于卫，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

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朱熹解释说：“这个磬是乐器。荷是担。蕢是草器。此人足隐士。”

“荷”即为肩挑重担之义，能负重者自是大器。但大器亦仍由人的根底处、内心处、日常处日积月累，方可以担负重任。南宋时浙江余杭径山寺的宗杲禅师曾作《又作偈》，他对跟学佛参禅的人说：“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担大事不寻常。一毛头上通消息，遍界明明不覆藏。”他还说：“欲学此道，当于自己脚跟下理会。才涉秋毫知见，即蹉过脚跟下消息。脚跟下消息通了，种种知见，无非尽是脚跟下事。”知难行易，恒者为成。能以“荷”担重任，非一蹴而就，而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正如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吴羹梅（1906—1990年），又名吴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人。我国著名的民族企业家，中国铅笔工业奠基人，被誉为“铅笔大王”。自1935年创办中国第一家国产铅笔厂起，他用小小的铅笔绘制了一幅民族轻工业自强不息的时代画卷，书写了中华儿女甘于奉献的爱国情怀。

（一）

1906年，吴羹梅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当时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也是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的年代。1922年秋，16岁的吴羹梅考入同济大学，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他因强烈抗议北洋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被同济大学开除。几经考虑，吴羹梅怀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决定去日本学习先进技术，以振兴中华。

1929年，吴羹梅考入日本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彼时，随着清末“废科举，办学堂”等维新运动的兴起，钢笔、铅笔等一些国外新式文具开始涌入中国。其中，铅笔因为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很快取代毛笔，国内市场需求巨大。但中国大陆还没有自己的铅笔厂，从普通铅笔到高级绘图铅笔及彩笔，都依赖进口，国家每年为此花费大量钱财。吴羹梅深感铅笔对振兴我国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逐渐确定了制造铅笔的创业目标。为学习制作铅笔的知识，1932年3月，吴羹梅进入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下属的神奈川工场实习。但该厂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制铅芯技术是严格保密的。吴羹梅尝试找该厂经理请教，经理却傲慢地说：“办铅笔工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像你办华侨学校。你们不会办成铅笔厂，生产出铅笔。”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吴羹梅，也更坚定了他创业的决心。最终在车间工人的帮助下，吴羹梅掌握了制作铅芯、制杆和油漆的技术。

1933年11月，吴羹梅回到上海后，邀请同窗郭子春、同乡章伟士共同创业。为筹措资金，吴羹梅变卖了家中房屋，并发动亲友入股投资，最终筹到5万元启动资金。同时，经过反复试验，吴羹梅带领工人逐步攻克铅芯、铅笔板和油漆等方面的技术难关，具备了生产铅笔的实力。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35年10月，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1942年改为中国标准铅笔厂）正式投产营业。20世纪30年代，销往我国的国外铅笔应有尽有，国产铅笔想挤进这个市场并不容易。为冲破国外舶来品的倾销，吴羹梅采取了两大策略。一是主打低档产品，推出普通飞机牌铅笔。以“好学生”和“小朋友”命名的低档产品，注重降低成本、降低价格，以价格优势打开了销路。二是抓住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的有利条件，增强国产铅笔的竞争力。“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潮。吴羹梅抓住机遇，将“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印在每一支铅笔上，并结合航空救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出以“航空救国”命名的中档铅笔，激发国人爱国情怀，深受国人欢迎，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

1937年，工厂生产的高档绘图铅笔，已实现“完全国货”，吴羹梅特意用自己的名字“鼎”作为注册商标。从此，中国人真正用上了国产铅笔。

（二）

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铅笔厂已初具规模。但国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打乱了工厂的生产秩序。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火烧到上海。为了不让千辛万苦建立的工厂落入敌手，吴羹梅决定将铅笔厂内迁重庆。1937年11月首迁武汉，1938年4月再迁宜昌，1938年11月三迁到重庆。内迁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却难改吴羹梅抗日之志。每到一地，铅笔厂均迅速投入紧张的生产，支援抗战。

1939年上半年，工厂在重庆菜园坝正式恢复生产。然而，由于内迁工厂大量涌入重庆，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生产时断时续，铅笔厂要维持生产，困难不言而喻。尤其是日本飞机频繁轰炸滋扰，人们不得不躲进防空洞，工厂只能停产。1939年至1940年间，工厂两次遭日机轰炸，吴羹梅也被炸伤住院。因为轰炸，菜园坝工厂已无法维持正常生产，吴羹梅决定在离重庆市区较远的南温泉增设分厂。吴羹梅表示，只要抗战需要，再艰难也要维持下去。

从1938年11月迁到重庆，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走，铅笔厂在重庆的7年，生产受到诸多限制，平均月产量为4000支（每罗144支），远远低于上海时的产量，但工厂在艰难生存中仍然取得一定的发展。为解决维修难题，工厂增设了修机车间，该车间不仅能维修破损严重的机器，还能制造全套的制笔机器，方

吴羹梅： 中国铅笔工业奠基人

便了工厂的生产。为了扩展产业链，吴羹梅先后创办光华油漆厂、中和化工公司、中国标准锯木厂等。同时，为了扩大产品的销售量，1940年起，吴羹梅陆续在重庆、贵阳、衡阳、昆明、西安、兰州等地设立发行所，依托这些发行所，把产品运往后方各地。从重庆到延安、从战场到教室，这家中国大后方唯一的铅笔厂，为抗日救国和中国文教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艰难维持的情况并未好转，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民族企业恢复生产，反而给以无情的刁难、压榨。铅笔厂难以维持，不得不遣散员工，重返上海。

（三）

铅笔厂迁回上海后，原材料的采购比重庆时相对容易，但竞争更为激烈。在抵御外货倾销的同时，还迎来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两个强大的国内竞争对手。吴羹梅为站稳脚跟，把生产重点放在普通铅笔市场上，主推低档飞机牌“好学生”铅笔。同时，大力开辟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两厂未深入的华北市场，使“好学生”很快畅销于华北与东北地区，工厂一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新中国成立后，吴羹梅和他的铅笔厂重获新生，进入全新发展阶段。鉴于吴羹梅的杰出贡献，1949年10月1日，他作为工商界的15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受到毛泽东接见。他先后被任命为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为响应政府号召，1950年中国标准铅笔厂率先实现公私合营。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高级工程师设计制图铅笔的需求量大增，但国内质量过硬、规格齐全的绘图铅笔还是空白，市场被昂贵的国外产品占领。1954年3月，中国标准铅笔厂经过夜以继日的攻关，生产出赶超国外先进水平的“中华牌101绘图铅笔”向国庆献礼。1954年6月，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中国标准铅笔厂的产品正式定名为“中华牌”。1954年10月，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合并，顺应历史潮流，成立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吴羹梅出任私方经理。其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改为中国铅笔公司一厂，1955年6月，更名为中国铅笔一厂。

随着产量产值的不断增加，1958年中国铅笔一厂开始出口铅笔，有力推动了我从铅笔进口大国转变为出口大国。“中华牌”铅笔也因此深受人们喜爱，成为跨越几代人的“人生第一笔”。

